

远方出版社 ■

西方的没落

(下)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SHIJI SIXIANGXUESHUMINGZHU WENKU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西方的没落

(下)

ISBN 7-80723-134-3



9 787807 231349

书号：ISBN 7-80723-134-3

定价：1480.00元（全52册）

西方的没落

——对世界历史的透视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下)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 (甲) 宇宙和小宇宙	(1)
第二章 起源与景观 (乙) 高级文化的类型	(24)
第三章 起源与景观 (丙) 文化之间的关系	(62)
第四章 城市与民族 (甲) 城市的心灵	(99)
第五章 城市与民族 (乙) 民族、种族、语言	(131)
第六章 城市与民族 (丙) 原始人、文化民族、 费拉	(187)
第七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甲) 历史上 的假晶现象	(223)
第八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乙) 枚斋的 心灵	(274)
第九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丙) 毕达哥 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	(312)
第十章 国家 (甲) 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	(393)
第十一章 国家 (乙) 国家和历史	(436)

第十二章	国家（丙）政治的哲学·····	（529）
第十三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甲）货币·····	（562）
第十四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乙）机器·····	（594）

第十章 国 家

(甲)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

—

被我们称为生活的宇宙长河的一种深不可测的秘密就是它们分成两性。在固定在土地的植物界的存在之河里,宇宙长流就在试图彼此分开,就像开花植物的像征提示给我们的一样——分成一种本身就是这个存在的东西和一种使这个存在延续下去的东西。动物是自由的,是一个大世界——宇宙——中的若干个小世界,它们作为小宇宙而分离开来,并且与大宇宙互相对立。同时,当动物界展现其历史时,阳性和阴性的双重存在的两种方向就日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阴性更接近宇宙。它更深地植根于大地中,而且它直接卷入了自然界的伟大循环的节奏之中。阳性则比较自由,更具有动物性,更容易受到感染——就感觉和理解等方面而言——更为觉醒,更为紧张。

男性体验着活生生的命运,并且领悟因果之律,也就是领悟已经形成的因果逻辑。相反,女性本身就是命运、时间和正在形成的有机逻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果律的原则对她来说永远是陌生的。每当男人试图给予命运以任何可触知的形式时多他总感到它是阴性形式的,称它为莫爱拉女神、帕尔卡女神、诺尔恩女神。最高的神本身从来不是命运,却总是它的代表或它的主人——正如男于代表或支配女于一样。起初,女性也是预见者,不是因为她知道未来,而是因为她就是未来。僧侣只阐述神谕;女性则是神谕本身,时间就是通过她来表现的。

男性创造历史,女性本身就是历史。在这里,十分清楚但还难以理解的是,一切活生生的事变都具有双重意义——方问,我们感到宇宙长流如斯,另一方面,前后相继的个人连续使我们回溯到作为这一长流的接受者、容纳者和保持者的小宇宙的本身。这“第二种”历史才是具有阳性特征的——即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较之阴性更有意识、更自由、更易激动。它回溯到动物界的深处,并在诸伟大文化的生活历程中得到最高象征的和世界历史的表现。相反,阴性是世代相续的原始的、永恒的、母性的、植物性的(因为植物内部总有某种雌性的东西)无文化的历史。这种历史永不改变,而是始终如一地、沉寂宁静地贯穿于各种动物和各种人类的存在之中,贯穿于一切短暂的个别文化之中。回想起来,它本来是和生活本身同义的。这种历史也不是没有它的战斗和悲剧的。女于在分娩时就识得了她的胜利。阿众特克人——墨西哥文化中的罗马人——把在分娩中的妇女当作一个勇敢的战士来尊敬,如果她死了,人们就用像阵亡的英雄一样的葬仪来埋葬她。女于的政策永远是征服男子,通过男于,她能成为孩子们的母亲,通过男子,她能成为历史、命运和未来。她的极度羞涩的目标、她的灵巧手腕的目标,从来就是她的儿子的父

亲。相反,男子的重心主要放在另一种历史上面,要那个儿子作为他的儿子,作为他的血统和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传递者。

在这里,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两种历史正在为权力而斗争。女人是强有力的,完全是她的本来面貌,她只根据同她本身和她的命定的角色的关系去体会男子和儿子们。反之,在阳性存在物方面,却存在着某种矛盾;他是这个男子,同时又是另一种人,这另一种人是女人既不了解也不承认的,她认为这是对她的最神圣的事物的劫夺和暴行。两性之间的这种秘密的和根本的战争,从有两性时起就一直在进行,而且在两性继续存在时,仍将不声不响地、剧烈地、不容情地、残酷地继续进行下去。在这场战争里面,也有政策、战斗、联盟、条约和叛变。在两性间盛行着对尘世的深深迷恋和方向明确的原始本能所产生的爱与恨的种族感情——而且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另一种历史中的爱与恨的种族感情相比更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人世间有爱情抒情诗和战争抒情诗、爱情舞蹈和武器舞蹈,有两种悲剧——奥赛罗和麦克白。但在政治世界中,还没有任何东西能跟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或克里姆希尔特的巨大仇恨相比。

因此,女人鄙视另一种历史——男人的政治——那是她根本无法理解的,她看到的只是那种历史从她身边夺去了她的儿子。取消无数次分娩的胜利,对她说来难道是一场胜利的战斗吗?男人为了自己的历史牺牲女人的历史;无疑地,世间也有一种女性的英雄主义,它骄傲地奉献出她的儿子(喀德邻·斯弗察在伊莫拉的墙垣上),不过尽管如此,过去有过、现在有并将永远有一种女人的——甚至动物界的雌性的——秘密政治,它力图把她的男子引离他的历史,并把他的身心都编入她自己的植物性的属类相传的历史中——即:编入她自己中。然而,男人历史中所完成的一切是在家庭、妻儿、种族等等口号下完成的,其目

的是在掩护和维持这种生与死的历史。男人和男人的冲突，始终是为了血统、为了女人。女人，作为时间，是历史存在的根本原因。

具有种族性的女人，甚至在她还不知道这一点时就已经感觉到了它。她是命运，她扮演命运。这场戏剧从男子们为占有她而进行斗争开始——海伦、卡门的悲剧、喀德邻二世、拿破仑和那终于把贝尔纳多特引向他的仇敌方面的黛赛利·克莱丽的故事——而且，这不仅是一种人类的戏剧，因为这种斗争早往动物界中就开始了，并充满了全部动物的历史。而在她以母亲、妻室或女统治者的身份支配各帝国的命运时——尼亚拉英雄故事里面的霍尔哥德、法兰克皇后布伦谢尔德、把罗马教皇职位给予她所选中的男子们的马路夏——这种戏剧便达到了顶点。男人在他的历史中向上爬，直到掌握一个国家的前途——随后，女人到来，迫使他屈膝。民族和国家可能因此而走向毁灭，但她在她的历史中已经获得了胜利。说到底，这始终是一个具有种族性的女人的政治野心的目的。

因此，历史具有双重含义，任何一种都不能褻渎。它是宇宙的或政治的，它是存在或保持存在，有两种命运、两种战争、两种悲剧——公众的和私人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这种双重性从世界上消除掉。这种双重性是根本的，植根于既是宇宙中的小宇宙又是宇宙的参与者的动物的本质中。它以一种职责冲突的形式出现于一切意义重大的关头，这种冲突只对男人才存在，对女人则不然，而且在一种高级文化的进程中，这种冲突从未被克服过，却只是更加深而已。有公共生活，也有私人生活，有公法也有私法，有公共礼拜也有家庭礼拜。作为等级，存在对前一种历史是“合乎形式”的；作为族系，它在源源长流中本身就是后一种历史。这就是古代日耳曼人对血统关系的“刀剑方面”和“纺缍

方面”之间的区别。定向时间的双重意义的最高表现存在于国家和家族的观念之中。

组成家族的是活的材料,组成家室的是死的材料。当家族生活的结构和意义发生变化时,家室的规划也随之发生变化。古典类型的父系家族与古典的住宅样式相适应。这在希腊的城市法中比在日后罗马的城市法中规定得更为明确。它把等级完全看作当前存在于一种欧几里得式的此时此地中的等级,正如城邦被想像成为现存实体的一种集合体一样。因此,血统关系对它既不必需也不充分;它停止在家父权的限度内,停止在“家屋”的限度内。这样的母亲对她亲生的子女没有父系方面的关系;只在她像她的后嗣一样受她活着的大夫的家父权支配时,她就成为她的孩子们的父系姊妹。相反,枚斋型的母系家族却与“一致”的观念相符。这种家族是典型地由父和母双方的血统关系延续的,并具有自己的“精神”,一种小范围内的一致,不过没有特殊的首脑。帝国时期的“罗马法”逐渐地从父系转向母系,意味着古典心灵的消亡和枚斋心灵的出现。查士丁尼的有关继承法改革的新法律的第 118 条和第 127 条确定了枚斋型家族观念的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个体川流不息地经过,成长着和消亡着,但都在创造着历史。这些前后相继的世代的共同脉搏越纯粹、越深刻、越强有力、越被认为理所当然,它们就越有血统、越有种族性。它们产生于无限之中,有着各自的心灵,这一群群的人们在其存在的共同波状节拍中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不是由共同真理联系起来的精神团体,如教团、手工业行会或学派,而是在战斗生涯的混战中形成的血族同盟。

有些存在之河是“竞技状态良好”的,它的意义跟这一术语运用在运动游戏方面的意义相同。当马腿稳当地跨过障碍物,

马蹄也安稳地并有节奏地踏在平地上的时候,一群障碍赛马者是“竞技状态良好”的。当角力者、击剑者、球类运动员处于“良好竞技状态”时,那些最危险的动作和活动就很容易而且很自然地表演出来。当一个艺术时代的传统成为第二天性时,有如对付法之于巴哈一样,它就是合乎形式的。当一支军队是像在奥士特里齐一役的拿破仑的军队和色当一役的毛奇的军队的时候,它就是合乎形式的。事实上,在世界历史中、在战争中以及在我们称之为政治的战争的智性手段的延续中所完成的一切,在一切成功的外交、策略和战略中所完成的一切,在国家、社会阶级或政党的竞争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那些自认为“合乎形式”的活生生的统一体的产物。

用来表示种族(或种属)教育的词是“训练”,以区别于那种在一致性的训诫或信仰基础上对觉醒意识团体的塑造。例如,书籍是塑造的媒介,而经常被人们感受到的环境的节奏和协调则是一些训练的力量,人们自己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感觉和生活的——如同哥特时代早期的一个新人教者或一个见习骑士。某一社会的“良好形式”和礼仪是某一种存在的节奏的感觉表现,一个人要掌握它们就得具有它们的那种节奏。所以,妇女由于本能较强且更接近宇宙的节奏,就比男子更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形式。下层妇女经过几年就能完全有把握地在上等社会中活动——同样她们也很快地又掉下去。但是男人则变得很慢,因为他们更觉醒,更知晓。无产者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贵族,贵族也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无产者——只有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中,才会出现新环境的节奏。

形式越深奥,它就越严格,越令人生厌。因此,在局外人看来,它就像是一种奴役;相反,其成员却能充分地、轻易地掌握它。作为形式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林尼亲王不亚于莫扎特;

这同样也适用于每个天生的贵族、政治家和将领。

所以,在所有高级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在广义上是种属、族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自然本身)的农民阶级,还有一种明确无误地“合乎形式”的社会。它是一组阶级或等级,而且无疑地是人为的和暂时的。但是,这些阶级和等级的历史却是最富潜力的世界历史。只有从对它的关系来看,农民才被否成是无历史的。这六千年的全部广阔宏伟的历史已在高级文化的生活历程中得到完成,因为这些文化本身把它们的创造的焦点放在了具有种类和训练的诸等级身上,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就成为有训练的和有教养的。一种文化是以可感觉的形式实现自我表现的心灵的,不过这些形式是生动的和发展着的。它们的母体处于个体或集体强化了的存在之中——也就是,处于我刚才称之为“良好状态”的存在之中。只有当这个存在充分达到那种高度的适合状态时,它才是一种可作代表的文化的代表。

这种文化不但是一种宏伟的事物,而且跟有机世界中任何其他事物截然不同。在这唯一的一点上,人类使自己高出自然的力量,并自己成了一个造物主。甚至就种族、种类来说,人也是自然所创造的——他是培育出来的。但是,作为等级,他培育他自己,就如培植他周围的高贵的动植物品种一样——这种过程也是一种具有最深刻的和格极意义的“文化”。文化和阶级是两个可以交换使用的用语;它们一同出现,它们一同消失。葡萄、水果或花草的良种的培植,良种马匹的饲养,是一种培养(文化),而在完全相同意义上的人类精华的培育(文化),则是一种已经使自己具有高级“形式”的存在的体现。

正因为如此,在每种文化中就都有一种这个人或那个人是否属于该文化的强烈感觉。古典人对于野蛮人的看法、阿拉伯人对于非信徒(阿姆哈阿拉兹人、照尔)的看法、印度人对于首陀

罗的看法——无论造成这种裂痕的根源是如何不同——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即,起初所用的词都不表示鄙视或憎恨,而只是断定在存在的脉搏方面有差别,这些差别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人们不能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发生任何接触。这种十分清楚、毫不含糊的观念已被印度的一种“第四种姓”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了,而就我们所知,这种种姓却是从未没有存在过的。摩奴法典及其关于如何对待首陀罗的有名的条例是费拉制在其印度的充分发展状态的产物,并且——不顾在现行的甚或可以得到的法规下的实际现状如何——采用了对待它的对立物的否定方式来描述婆罗门教的模糊观念,很像古典晚期的哲学采用从事劳动的“巴恼索斯”这个观念一样。前者使我们将种姓误解为是印度所特有的现象,后者使我们在古典人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基本观念。

在所有这些场合中,真正面对着我们的,是文化的精神生活及其象征所不认可的渣滓,它在原则上不属于任何具有真正意义的分类,有点像被忽视的远东“化外之民”一样。“基督徒团体”这一哥特人的观念明白地指出了犹太人的一致不在它的范围之内。在阿拉伯文化中,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只在犹太人、波斯人及基督教徒的各自的民族领域内,首先是在伊斯兰教的兵族领域内才被容忍,他被鄙视地划归他自己的行政与司法当局去管辖。在古典世界里,不仅蛮族是“化外之民”——在一定程度上奴隶也是“化外之民”,而土著的遗民如帖撒利的珀涅斯泰人和斯巴达的希洛人尤其是如此,他们的主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使我们想起了诺曼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和条顿骑士团在斯拉夫族的东方的行为。摩奴法典把恒河下游的“殖民”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的名称保存了下来,作为首陀罗阶级的称呼。(如摩揭陀就是其中之一,佛陀本人可能曾是一个首陀罗,像“阿

论迦王”一样,他的祖父旃陀罗笈多的出身就是最卑贱的。)剩下的是一些职业名称,这又提醒了我们,在西方和其它地方从事某些职业的人也是化外之民——例如,乞丐(在荷马史诗里乞丐是一阶级)、冶金匠、歌手和失业者,在哥特时代早期,他们可以说都是由教会的施舍和世俗之家的捐献所养育的。

但总而言之,“种姓”至少是一个被滥用得像被使用得一样严重的词。埃及的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没有种姓,在佛陀以前的印度也没有,在汉以前的中国仍然没有。只有在十分晚期的情况下,种姓才出现,以后我们在一切文化中就都见到了它们。从第二十一王朝以降(公元前1100年左右),埃及时而在底比斯的僧侣种姓统治下,时而在利比亚籍的军人种姓统治下;此后种姓凝间的历程不断前进,直到希罗多德的时代——他把当时的情况看成是典型的埃及式的,不正确与我们对于印度的情的看法恰恰是一样的。等级和种姓之间的区别就是最早的和最晚的文明之间的区别。在原始等级——贵族和僧侣——的兴起过程中,文化正在显现着自我,而种姓则是文化的最后的费拉式的体现。等级是最具有活力的,文化进入了完成的坦途,出现了“生活自身必然展现的形式”。种姓是绝对的完结时,发展已被不变的固定状态代替了。

然而,伟大的等级是跟由于技术传统及工作精神而在职业上结合在一起的工匠、官吏、艺术家等职业团体截然不同的。事实上,等级是有血有肉的象征,其整个存在,作为现像、作为态度及作为思想方式,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另外,在每种文化中,农民是纯自然和成长的一部分,从而是一种完全不具人格的表现,而贵族和僧侣则是大力培养与形成的结果,因此就表示一种彻底具有人格的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它的形式的高度,不仅摈斥蛮族,而且也立即把一切不具有他们的身份的人看成一种渣滓

——被贵族视为“庶民”，被僧侣视为“俗人”。这种形式的人格是费拉时期到来时僵化为种姓类型的物质，此后，这种种姓在好几个世纪里都保持不变。在活的文化中，种族和等级是没有人格的事物和有人格物之间的对立；在费拉时期，群众和种姓、苦力和婆罗门则是没有形式的事物和有形式的事物之间的对立。活的形式变成了公式，仍有型式，但是那在型式上已经僵化的型式。种姓的这种僵化了的型式是一种极端精巧、尊贵和智性的东西，它觉得自己无限地优越于一种文化中的正在发展的人类——我们几乎无法想像，满清官吏或婆罗门教徒是怎样高傲地蔑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埃及的僧侣会多么看不起一个来访的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这种僵化了的种姓怀着拜占廷心灵的高贵心情随着时间无知无觉地前进，这种心灵将它一切问题和无法理解的解事物都远远抛在后面了。

二

在加洛林王朝的前文化时期，人们将奴隶、自由民和贵族区分开来了。这是一种只根据外部生活的事实而进行的原始区分。但在哥特时代早期就有这样的话：

上帝塑造了三种生命，
它们是农民、骑士和僧侣。

在这里，我们具备了一种刚刚觉醒的高级文化的身份差别。袈裟和刀剑作为等级站在一起，异常执拗地反对耒耜，即渣滓、非等级者；那非等级者和等级本身一样是事实，但和等级自己不同，是没有比较深刻意义的事实。这种分离是精神上的，是被感觉到的，它是如此命定的、有力的，以致任何理解都不能予以忽

视。怨恨从乡村中进涌出来，藐视从城堡反射回去。在这些“生命”之间制造这种鸿沟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权力，更不是职业。制造这种鸿沟没有逻辑上的理由。它具有形而上的性质。

后来，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但比城市年轻，出现了作为“第三等级”的市民、资产阶级。此时，市民也看不起乡村，乡村在其周围，死气沉沉、没有变化和一味忍受，与乡村相比，他觉得自己是更为觉醒和更为自由的，因此在文化的道路上是远为先进的。他也看不起原始的等级，“乡绅和牧师”，认为他们在智能上比他低，在历史上则落于己后。可是、跟这两个等级相比，市民现在是一种渣滓，一个非等级者，就像农民过去是一种渣滓，一个非等级者一样。在“特权者”的心目中，农民现在几乎根本不算数——市民算数、但被看成一个敌方和一种背景。他是一种衬托，其他的人借之以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这种重要性是超乎一切实际考虑之外的东西这一事实。当我们发现，在一切文化中同样的事情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时，当我们发现，无论一种文化的象征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怎样不同，它们的历史全处于这些集团的对立中，并由这些集团的对立——在青春时期是感情冲动的农民战争，在晚期是在智能基础上发生的内战——所完成时，那么很显然，必须从生活本身的最深刻的基础中去探寻事实的意义。

这种观念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始等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只能建立在这两个原始等级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使这两个等级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地位是神授的，因此是根本不允许非议和责难的——这种地位不但把自尊和自觉看成一种义务，而且把最严格的自律（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牺牲生命）也看成是一种义务，并且，这种地位还使这两个等级传染上历史的优越感和心灵的魔力，它不是通过权力得来的，事实上，它是产生权力的。

那些内心地而不仅是有人有名无实地属于这两个等级的人实际上是和渣滓不同的；这两个等级的人的生活跟市民和农民的生活比起来，处处受到一种象征性的尊严的支持。这种生活并不是仅仅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必须具有意义。这两个等级所表现的是一切自由活动的生命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完全是存在，另一方面完全是觉醒的意识。

每个贵族都是时间的一种活的象征，每个僧侣都是空间的一种活的象征。命运和神圣的因果律、历史和自然、时间和地点、种族和语言、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所有这些部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大可能的表现，贵族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里面，僧侣生活在一个真理的世界里面；一个有机智，另一个有知识；一个是作文行家，另一个是思想家。贵族的世界感情实质上是节奏感，僧侣的世界感情则完全是由张力发出的。在查理曼时代和康拉德二世时代之间，在时间之流中，某种东西自动形成了，它不能被说明，但假如我们试图了认识新文化的黎明，那么就必须去感觉它。世间早已有了贵人和教士，但那时才第一次——而且不久——有了贵族和僧侣，这两个词是就它们的重大意义及其象征意义的全部力量来说的。这种象征开始得如此强大有力，以致在最初，所有其他区别如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区别都退到幕后去了。从爱尔兰到喀拉布里亚，在一切土地上，哥特时期的僧侣系统成了一个单一的伟大的团体；在特洛耶城下的早期古典武士，或在耶路撒冷城下的早期哥特武士，从我们看来，好像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古埃及的省和周代初期的封建国家，和这类等级比起来（并由于这种比较人就像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的勃艮第和洛林一样，黯然无光。在每一种文化开始和结束时都会出现某种世界主义的情形，但是，在开始时，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贵族——僧侣形式的象征力量仍然高出民族的形式